

明清时期云南的中医药瘟疫防控(上)

□ 杨祝庆

自明初开始,大批军队和移民不断进入云南,戍边屯田,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军医、民医、医官等医药人才。根据历史资料对比分析,明清两代500多年是云南疫情高发期。云南各族人民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也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中原的医药理论和技术,吸收云南各民族医药经验,形成了具有云南特点的中医药技术和医药文化,在云南医药史上出现了一个高峰,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医药著作,如明代刘寅的《伤寒脉赋》、兰茂的《滇南本草》和《医门摘要》,清代管浚的《管浚秘方》、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姚文藻的《痘疹经验录》、李本修的《瘟疫集要》、奚毓崧的《伤寒逆论》、曹鸿举注的《瘟疫论》和《瘟疫条辨》等。这些著作,对瘟疫等传染病防治作了精辟分析,是明清至近代云南中医药防控瘟疫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实践验证。



古人应对瘟疫的方法

从古至今,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和应对方方法,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从来没有一次到位的认识。有些古代应对瘟疫的方法已经消失了,但今天的人们没有理由用后来的科学进步去要求古人,更没有理由嘲笑前人的探索。今天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实践积累。明清时期云南应对瘟疫,有一些普遍使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十分独特。

炉烟瘴疟法。明代医药学家兰茂在《滇南本草》中,记载炉烟瘴疟法。明代,防治瘴疟(又称瘴气、瘴疫、疟疾等)的办法是支起火炉,烧出烟雾,以熏驱瘴气。其实,烟熏瘴气的方法由来已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司爟,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救时疾。”古代设置专门掌管用火祛疫的官吏“司爟”,负责动员民众,利用火来烧燎防疫。《周礼·秋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翦氏与庶氏等官职,他们使用莽草、嘉草等来烧熏驱虫。在当时条件下,“炉烟瘴疟”之法是驱赶蚊蝇和隔离技术的艰难探索。面对灾难,先民们奋起抗争,绝不屈服,这种斗志正是战胜病魔的力量来源。

在云南明代的医药条件局限之下,燃烧烟雾驱赶蚊虫,阻断病菌传播渠

道,是可行的方法。据史料记载,用烟熏防疟疾传播的举动,根据疫情持续时间,有时可持续一年或更久。以烟治疗的方法,一直流传下来,据民间调查,到20世纪60年代昆明杨林、寻甸一带农村仍在使用这一方法。盛夏黄昏,蚊蝇漫天飞舞,村民用诸葛草在堂屋里烧起火堆,烟雾弥漫整个屋子,以驱逐蚊蝇。各地燃烟所用材料不一,多采自本地的艾蒿、黄草、青蒿、膏滋、香薷等植物,平时晒干备用。

芸香草治烟瘴。韭叶芸香草又称诸葛草,《滇南本草》中的“注补”说:“昔武侯入滇,得此草以治烟瘴。此草生永昌、普洱、顺宁茶山地方,形如兰花,但叶有细白毛,且如韭叶,但韭叶则软,芸香草硬。”三国时期,诸葛亮进入云南用韭叶芸香草祛除瘴气。但史籍中只有言片语,对使用方法未载其详。芸香草味厚,能驱蚊,据此推测,诸葛亮可能是用芸香草烟熏或煮大锅药来祛除瘴气。到了明代,兰茂对芸香草的使用,在继承中又有发展,《滇南本草》记载用芸香草煎服,这个用法的生物利用度更高。

如今,在云南一些地方,民间每逢端午节,仍焚烧芸香草、艾草、白芷、艾叶、丁香、硫黄等药,进行空气消毒;用雄黄酒喷洒潮湿的地方,作室内消毒;同时在饮食中吃大蒜,出行时擦擦雄黄

酒,作个体消毒。这些习俗,都反映了古代人民防疫祛病的传统。

用酒水服药。古代的发酵酒,在传统中医药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南本草》记载用水酒服药治疗瘴气的经验:“元江瘴气,用树绿皮晒干为末,于临发时以水酒度下”;“临安瘴气,用野葛菜根水酒煎服”,把一些中草药晒干研成粉末,用水酒度下,作为预防用药。明代兰茂将酒用来作为防疫的辅助用药,沿袭了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防疫经验。

培养正气,补肺截疟。兰茂《医门摘要》是《滇南本草》的姊妹篇,它对云南地方病、常见病和传染病,提出了具体而独到的治疗方案,从中可窥见明清时期云南防疫疟疾、霍乱、痢疾等重大传染病的方法和思路。《医门摘要》说:“疟疾”如面色青黄者,补中汤加首乌、鳖甲、常山、草果、广子(槟榔子)、姜枣治之”。这一治疗方法,继承了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截疟七宝饮”的处方,常山为落叶灌木,属于虎耳草科植物,一直是中医治疗疟疾专药。《医门摘要》对古方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它以“截疟七宝饮”来催吐,同时用补中汤来补益脾胃,巩固根本,治标却不忘治本。培补正气是兰茂用药的显著特点,他告诫说:“养正则邪气自除”。这一观点,与当代增强身体免疫力抵抗疾

病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

具有创见的医药理论

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主流中医药理论传入云南后,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期实践和著名医药家的诊治探索和理论总结,与云南气候、地理、物产、习俗相结合,产生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应对瘟疫方法。兰茂《医门摘要》中说:中暑(包括后世所称的霍乱、痢疾、伤寒等疾病)“此症北省夏秋始有,滇省节候不真,四时俱有,轻为霍乱,重即绞肠痧(千霍乱)”。由于云南四季不分明,常年都有中暑病人,轻的为霍乱,上吐下泻;重的为绞肠痧,肚腹扭疼,欲吐不能,欲泻不能。因此,在治疗上,不能拘泥于前验。兰茂指出:对云南的霍乱、痢疾等急慢性传染病,“不可过补,亦不可过泻,宜和解之”,不可过分发汗,也不可大剂量攻下,应当和解表里。即要防止错误地攻下而变成痢疾,也要防止错误地发汗,致使体液虚脱而变成伤寒,对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医门摘要》专列一节“中暑合症”,并列出和解表里的“中暑附方”,兰茂的这一理论,实为云南明清时期的防治方案和操作指南。

兰茂在继承传统用药理论的同时,又能根据云南特点加以变通。例如,《医门摘要》所用小柴胡汤,与汉代张仲景

《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不同。兰茂说,云南“天偶阴即冷,人冒之即为寒感症”,在滇中地区“遇雨便成冬”这一气候特点影响下,云南春季时常暴发的一些传染病,除具有内地常见的主要症状外,还常出现云南本地特有的症状,须要辩证施治。兰茂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感寒”的概念,指明“感寒独伤于阴”(不伤于阳),揭示了本地特有症状的病因。据此,在治疗方法上,兰茂提出“感寒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阳)”,就是说,内地的伤寒或疟疾,可发汗解表,而云南的伤寒或疟疾,不能发汗解表,应温补于内,重在补阴。

兰茂在《医门摘要》中,创制了专用于云南本地的小柴胡汤。该方保留了《伤寒论》小柴胡汤合表里的制方之旨,又将人参改为沙参,以补阴;加入云南常见的葛根,疏散风热;减去大枣,增加陈皮,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经过兰茂加减后的小柴胡汤,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最终使患者气血平衡,恢复如初。

兰茂创立的“感寒”理论及其对治疗方法,在几百年中为医家所珍视,并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今云南特产中成药“参苓健脾胃颗粒”,很好地传承了兰茂的医学思想。

(作者单位: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文史笔记

沾益州安氏土司的兴衰

□ 侯文科

土司制度在云南源远流长,从实质上讲,汉武帝在滇池区域设立益州郡,任命滇王、赐滇王金印,就是云南土官制度的开端。之后从诸葛亮七纵孟获到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政策,都是这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演变。到元代,这种土官开始称土司并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管理、考核、升赏制度,云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土官、土司成了其原来区域内更加合法化、编制化的实际统治者和“世拥其兵”的操控者,是巩固朝廷派的有任期的流官对地方实施有效管理的中坚力量。

安氏土司的崛起

宣威在元代属鹿卢部,讹称为罗罗,到元末期,以安举宗为头领的安姓发展成为豪族大姓。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沾益州,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3县,州治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曲靖路总管府为宣抚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政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万户以镇之”,大德七年(1303年)又将贵州普定路改归曲靖宣慰司管辖,至此,曲靖宣慰司掌管当时的曲靖路、澂江路、仁德府、普定路、普安路(今曲靖、玉溪两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和昆明市的寻甸县、贵州普定所辖大部分地区和普安)的广大区域,安举宗任宣慰使,掌军政民政,兼行都元帅府职责,是云南行省下的实权派人物之一,从此宣威安氏家族走上了土司统治的政治舞台。

元代天历年问,云南藩王秃坚不花、万户伯忽等叛乱,安举宗平叛有功,封怀远将军,加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掌行省流官官衔,实际履行着对宣威及其周边广阔地区的管理。继安举宗后,至四世土司阿哥,袭封行省参知政事,后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随傅友德征大理有功,加授沾益州土知州,从此安氏世袭沾益州知州职十八代,其政治中心就在今宣威市河东营村,延续到清初改土归流时期。在土司衙署后的乌蒙山山腰处,是安氏的兵营,掌握着辖区内四十八个武装点的调动权。县志载:“土州营栅,坐石龙山,险阻四塞,介黔蜀之交,所部四十八营火,以勇健称,其众三倍于乌撒”。

从安举宗任宣慰使,到末代土知州安于蕃止,共436年的时间里,安氏一直统领和掌控着沾益州,其统治力量以姻亲、过继承袭等关系,在沾益州周边北起宣威市,南至富源县,东起贵州普定,西至昆明寻甸县的广大地区都有渗透和联系。

安氏土司署现仍保存在其后堂建筑一栋,三开间一楼一底土木结构,坐东向西,位于石龙山(乌蒙山)西麓,为清初遗留建筑,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安氏土司的没落

安氏土司对沾益州400多年的长期统治,使其区域性逐渐凸显,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时常出现与邻境土司相互构兵或联军抗击流官执政而屡兴兵祸的情况,对区域内佃农也屡屡出现盘剥过盛和草菅人命的现象。县志载:“土官之取于民,百倍上供之数,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娶一妻,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银数十两,终身无见天日之期”。甚至出现“其人民皆知有土官,不知有朝廷”的局面。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力主土司对统治区域的沉重盘剥和屡兴兵灾的罪责,请求施行改土归流,得到雍正皇帝允准。恰值宣威籍举人尹治在京师候选,感于民众之无辜,上呈通政司,列举安于蕃十六条罪状:“日杀乳母于东山、日囚血叔于南楼、日不父其父而称其祖……”雍正皇帝命交军机处与鄂尔泰所奏并案办理,沾益州改土归流之议尘埃落定。

雍正四年(1726年),曲靖府差役到沾益州提案,依旧例,沾益州派差役人员协助。办理过程中,府役与沾益州土目发生争执,恰值安于蕃与沾益州牧张崇因事不合生隙,张崇趁机弹劾安于蕃,请旨治其罪,正式引发沾益改土归流。鄂尔泰即檄令寻沾益游击祝希尧,将安于蕃擒拿解送行省,请旨定罪获允。同年十月,鄂尔泰令流官张棨及曲靖府通判处徐德裕,清丈沾益州所辖各营区田地,次年七月,改设宣威州,自永安铺以北属沾益州,以南属宣威州。

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安于蕃被安置到江南江宁府,“诏发于蕃江南江宁府安置安氏之世,以绝安氏”。至此,安氏十八代土知州统治沾益州的历史谢幕,原沾益州的核心区行政区划易名“宣威”,并沿用至今。

(作者单位:宣威市文物管理所)

石羊古镇:纪念馆领略大姚红色文化

□ 本报记者 李悦春 文/图

一个明媚的春日,我们走进大姚县石羊古镇,在一幢古老的中式建筑前驻足——深红色的格子门,雕花的窗棂,经过翻修后的白墙灰瓦,这是焕然一新的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

大姚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土地。1926年,大姚人赵祚传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六军团长过大姚,播下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地下组织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7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影响下,大姚地区爆发反蒋武装斗争;1949年,中共滇西工委在大姚成立“三姚支部”,1949年12月18日,大姚获得解放。为了纪念大姚的革命先烈和红军长征过大姚的光辉事迹,大姚县投资200万元重建了红色文化纪念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记录大姚党组织的革命历程、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以及共产党员的高尚精神。这个纪念馆如今已成为大姚县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

先烈气节

在纪念馆前厅,映入眼帘的几张照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德三,英俊的脸上透着坚毅;赵祚传,年轻而充满朝气;还有刘执之,赵贵一、王子近、高梁、封于齐等,他们是大姚的早期共产党员或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人。

云南祥云人王德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接受党组织派遣回云南领导革命工作,在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后,任书记。1930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时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省

常困难,赵祚传把家里寄来的生活费绝大部分都交给了组织,还3次变卖家产,为党筹集经费。1928年,赵祚传拖着重病之身,步行离开昆明回大姚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时,不幸被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在大姚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6岁。遇难的前一天,赵祚传坦荡安然地写就了饱含崇高情怀的5封遗书,这些遗书完整地保存在馆内。赵祚传在遗书中说:“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被捕了,那就要抱着临难不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为党为人民献出青春和生命”。

长征足迹

1936年4月,红六军团长征过大姚,历时三天两夜途经金碧、新街、石羊、

三岔河4个乡镇40个村庄,行程近百公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6年4月18日,红六军团进入大姚境内的李湾至七街宿营。在七街仓西村休整的红军官兵在肖克和王震的带领下,瞻仰了赵祚传烈士墓,并向烈士家属赠送一条毛毯,表示慰问。

4月19日天未亮,红军离开七街,经锁北、凉桥、大桥、柳树塘、土地祠等村庄,向盐丰县城石羊镇前进。10点左右,红军以猛烈火力攻城,战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国民党县长率部溃逃,红军攻下盐丰县城后,打开五井大盐仓,把30多万吨食盐分给贫苦大众,并砸开监狱大门,解救受冤被囚的群众60多人。20日拂晓,红六军团撤离盐丰,经祥云、宾川与红二军团汇合,从丽江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

展厅内陈列的图片中,就有1936年红六军团团长萧克及政委王震当年的身影,以及红六军团攻克盐丰县城、开仓分盐、解救受冤被囚的劳苦大众和大姚人民欢送红军场景。

当时红军长征过大姚时遗留在群众家中不少物品,后来征集入纪念馆收藏陈列,成为珍贵文物,是红军长征历史的实物见证。

民族解放

在二楼展厅,陈列有抗日战争时期大姚各族人民积极出兵抗战,出民工修公路、建铁路,积极交粮纳税支援抗战的图片和实物。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大姚人民展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据历史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大姚县伤亡人口1772人,其中直接伤亡人口772人(死亡730人、受伤42人),间接死亡人口1000人,还有灾民1000人。

在解放战争展区,展示了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的雄壮场景,大姚地下党组织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于1949年积极组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部队4次攻打盐丰县城。1949年12月18日,中共三姚区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八支队滇西人民自卫团北海大队的护卫下,解除国民党地方武装,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宣告大姚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大姚获得解放。

走出纪念馆,那段峥嵘岁月似乎还在脑海中翻滚,那融入历史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和红色基因,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大姚及云南人民共有的精神瑰宝,引领人们坚定从容地走向未来。



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

大姚红色文化纪念馆展厅